

[美] 莱斯特·C.瑟罗 著

得失相等 的 社会

——分配和经济
变动的可能性

D
DESHI
LANGDENG
DE
SHEHUI

商 务 印 书 馆

得失相等的社会

——分配和经济变动的可能性

〔美〕莱斯特·C. 瑟罗 著

李迈宇 译 罗志芳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年·北京

Lester G. Thurow

THE ZERO-SUM SOCIETY

Distribution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Economic Change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1981

本书根据美国企鹅书社 1981 年版译出

DÉ SHĪ XIĀNGDĒNG DE SHÈHUÌ

得失相等的社会

——分配和经济变动的可能性

〔美〕莱斯特·C. 瑟罗 著

李迈宇 译 罗志芳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998-7/F·100

1992年10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161千

印数0-3 400册

印张7

定价: 3.60元

中译本前言

本书作者莱斯特·瑟罗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参加过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属于自由派经济学家，著书颇丰，其中比较著名的三部书是：《得失相等的社会》，该书揭露了美国经济的弊端；《得失相等的对策》，提出了解决弊端的办法；《危险的思潮》，揭示了保守派经济学的危险性。

不久前，美国《幸福》杂志曾刊登过一篇专门介绍经济学家瑟罗的文章，文中写道：“如果民主党人在今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可能被任命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成为制订经济政策的关键人物。”瑟罗教授的经济思想、政策主张到底有些什么内容？何以会受到民主党候选人的偏爱呢？

能源、通货膨胀、缓慢的经济增长、环境的恶化、不可调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繁琐的法规是美国经济中由来已久的问题。对上述问题，保守派经济学者主张通过给企业以自由经营的权力、削减政府的社会开支、取消各种妨碍工商业经营的政府法规等办法来加以解决。对此，瑟罗教授并不赞同，他的思想是政府干预主义和自由市场思想的混合，他认为，政府干预和社会支出与经济成就之间并无冲突，政府干预是否可取不在于干预这一形式本身，主要在于其干预的内容及其后果如何。

《得失相等的社会》的中心思想是：美国社会中存在的许多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能源短缺、经济增长减缓等）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并不是因为没有解决的办法，而是因为每一种解决办法都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必然受损，因而每项经济目标的实现都要求相当一部分人甘心忍受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而在现实社会中，任何社会群体都不愿意为了整体利益而使自己承担经济损失，使他人获利，他们或者会通过正当程序否决某项决议，或者故意拖延某些决议，使其因费用过大而丧失吸引力，最后，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一个经济生活中充满了得失相等因素的社会里，如何才能解决现存的经济问题呢？其答案是首先必须权衡得失，确立一个“公平”的分配、再分配原则，然后才能确定哪些群体的要求应该加以满足，哪些应该加以回绝。

在《得失相等的社会》一书中，作者主要集中精力分析美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因而陈述多于立论，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作者则集中在该书的姊妹篇《得失相等的对策》一书中加以探讨。尽管如此，透过作者对美国经济问题的分析，我们仍可以看出他下列几点主要思想倾向和政策主张：

一、通货膨胀问题：作者认为通货膨胀源于社会经济群体对物价、工资同步上涨的要求。他认为，所有经济群体都害怕自己的实际收入因物价上涨而受到损失，因而纷纷要求工资与物价同步，所有群体的要求都加以满足，也就出现了通货膨胀；至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作者认为通货膨胀尽管扩大了某些个人的收入差距，但并没有扩大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通货膨胀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之所以被夸大了，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货币幻觉，二是个人道德观点的拘谨（即认为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不应该受到外在力量的侵蚀）。因此，作者在不否认通货膨胀是导致社会真实痛苦的根源的前提下，主张在医治通货膨胀时，必须慎重考虑选择一种方案，使其所必须花费的费用小于通货膨胀本身给大家带来的影响。

二、经济增长问题：和一般自由派学者不同的是，作者十分关

心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并对其它工业邻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美国而感到忧心忡忡，因而强调投资、技术进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加强工人之间的劳动协作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在投资方面，他认为，投资的实质就是紧缩投资，因为紧缩投资可以将资本和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转移到高生产率行业，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此外，作者还主张取消公司所得税以增加投资；在如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加强工人之间的劳动协作以提高个人和班组生产率方面，作者比较推崇日本式的劳资关系，主张按资历而非个人价值来决定聘用或解雇，也就是主张采取“先进后出”（最先雇用的人最后被解雇）的政策，认为只有在这种稳定的劳资关系中，工人们才可能欢迎技术进步，关心企业的发展，从而提供自愿的协作，提高个人和班组生产率。

三、对法规和管制的看法：作者并不一味地反对规章和管制，他认为，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是由一系列法规组成的，因而无管制的经济制度根本不存在，但他也不否认在美国社会存在许多愚蠢的政府规章，此外，他还认为，在许多领域规章应该更少一些，长期物价管制不宜实施。总之，作者认为各种规章存在的真正理由是为了改变收入分配状况（因而必然在提高某些人收入的同时降低另一些人的收入），所以，规章的好坏只有在预见到应该形成怎样的收入分配制度时才能加以判定。

四、直接再分配问题：作者认为，谈到这个问题就不能回避“公平”问题，到底什么构成公平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原则呢？他认为，只有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政府才知道应该满足哪些人的要求，应该回绝哪些人的要求，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只注意个人之间的贫富悬殊，还必须注意不同种族、性别、群体取得经济成就的机会的差别。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配不均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社会

经济原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瑟罗)口头上宣称要建立“公平”的分配制度,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在得失相等游戏中获胜的往往是大垄断资本家集团,失败者则往往是那些低收入阶层的人们。因为资产阶级政府不过是大垄断资本家集团的代言人,所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格局就永远也改变不了。正因如此,瑟罗教授在《得失相等的社会》一书中,尽管对美国经济中弊端的分析振振有词,但一涉及对策就显得软弱无力、含混不清,最终只好寄望于虚幻的“公平”分配原则的建立,而这种“公平”的分配原则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又何曾出现过呢?

总之,瑟罗教授的这本书全面、生动地分析了现代美国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它对于我们加深了解美国经济现状及其弊端是颇有启发意义的,对认识我国当前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不无有益之处。本书是一本通俗的、分析全面的、现实感较强的经济学著作,值得一读。

由于水平有限,译文错误在所难免,还望读者多加指正。

刘涤源 罗志芳

1988年4月8日,武昌,珞珈山。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运转失灵的经济制度·····	(1)
第二章	能源·····	(24)
第三章	通货膨胀·····	(39)
第四章	缓慢的经济增长·····	(75)
第五章	环境问题·····	(101)
第六章	日益扩展的法规·····	(118)
第七章	直接再分配问题·····	(149)
第八章	解决80年代的经济问题·····	(185)

第一章 一个运转失灵的经济制度

几十年来,美国人一直认为他们的经济是不可动摇的。但这种信念遭到了 1973—1974 年阿拉伯石油禁运的突然打击,几个沙漠酋长的联合行动,竟能使他们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像心脏病的初次轻微发作令人惶惑不安一样,这种突然暴露出来的经济脆弱性也使美国人惊慌失措,它提醒我们,美国经济也完全有可能遭受意外而黯然失色。

在1979年,当一个主要的石油出口商只关闭了几个月就又一次引起了排队购油的骚动时,人们不禁要问:第一次心脏病的轻微发作,难道不是一种更大灾难的前兆吗?看来好像无法解决的一连串问题——通货膨胀、失业、增长率下降、环境恶化、不可调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繁琐的法规——到处涌现出来了。是这些问题真的无法解决,还是由于领导者的无能?美国人已经丧失了勤劳的美德吗?我们已经不能再发明新工艺和新产品了吗?我们应该增加投资、减少消费吗?是否需要取消我们的社会福利、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制度,以利于竞争?为什么其他国家能干得比我们好?

美国经济曾经产生过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但现在它已大大衰落,而且每况愈下。不算中东那几个富裕的酋长国,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在 1978 年已降为第五,被瑞士、丹麦、西德和瑞典超过,^①占第一位的瑞士人均国民收入超过我们的45%。在这五国之外,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仅比我们低7%,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第32卷,第4期(1979年4月),第122、156、214、352、356、390页。

并且正在飞速地追赶着我们,在美国的全部历史中,我们的增长速度从未达到日本的一半。

尽管我们经济地位的衰落在70年代才开始引人注目,但是,早在50年代初期(当时我们保持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已有半个世纪),我们的经济地位实际上已被科威特超过。^① 我们忽视了科威特,因为它的财富是来自地下的石油资源,而不是自己挣来的。可是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优越地位也是建立在大量的矿藏、能源和天赋的气候条件基础之上的,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得天独厚,我们不是一个靠个人奋斗爬上来的穷小子,而是一个继承了大笔遗产的阔少爷,这笔遗产我们可能现在已经挥霍得差不多了,也可能如果没有这笔遗产我们根本就不能活到今天。

当然,人们总可以安慰自己说,事情并不如想像的那么糟。既然我们有许多商品不是在国际市场上买卖的,而且在美国国内比国外便宜,人均国民收入数额也许把我们相对的经济地位描绘得过于黯淡了。1975年,一部分美国经济学家认为,我们在工业国中仍享有最高的生活水平,^② 我们的人均收入落后于两三个国家的部分,已被较低的生活支出抵补且有余。

这种观念现今是否仍然正确,要看贸易条件的变化,那就是为了获得一定数量的进口,我们得以多少出口为代价。以瑞士为例,1978年的石油成本比1975年要低,^③ 尽管以美元计算的油价提高了,而瑞士法郎的价格却上升得更快,所以,瑞士购买一定量的石油所需的出口货物反而减少了,瑞士的国民收入比以前能买到更多的东西。像瑞士这样进口占国民收入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贸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第32卷,第4期(1979年4月),第228页。

② 欧文·克拉维斯,艾伦·赫斯顿和罗伯特·萨默斯:“100多个国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载《经济学杂志》1978年6月号,第215页。

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第32卷,第4期(1979年4月),第43、354页。

易条件的变化对实际生活水平能产生剧烈的影响。

计算人均国民收入虽然比较容易,但众所周知,要对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进行准确的比较却十分困难。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会自然而然地购买本国相对便宜的商品。嗜好、环境、传统和习惯都各不相同,各国人民所购买的劳务和商品也各不相同,一个国家的必需品可能是另一国家的奢侈品,医疗服务在一国由政府提供,在另一国可能需要个人花钱。而且到底应该怎样评价政府庞大开支的得失很难,譬如,我们在医疗服务方面的花费比任何国家都多,而从平均寿命来看(美国男性公民的平均寿命在世界上排在第十六位),我们的收获何以比其他国家为少呢?

不管我们现在的经济地位排在第几位,其他国家已经追上来了,即使现在还没有超过我们,不久就会超过。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赶超的过程倒是一件好事。大部分富人会觉得和富有的邻人住在一起比较放心,彼此关系不那么紧张,日子也更好过一些。唯一令人不那么舒服的是,如果邻居们继续富下去,而且富得相当快,就会使我们相形见绌。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告慰自己说,一旦其他国家赶上了我们,他们的经济增长一定会放慢,采取现成的技术,毕竟比发明新技术容易得多嘛!不管怎么说,我们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当这些国家的生产率已经接近我们的水平时,并且有些工业部门已经开始超过了我们,那种认为“赶上比超过容易”的想法就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1972年至1978年间美国工业生产率每年只递增1%,而西德则接近4%,日本竟超过5%,^①这些国家开发新产品和改进老产品的生产技术更新都比我们快。美国的大公司变成了推销那些完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第32卷,第4期(1979年4月),第154、214、390页。

全由日本人制造的新型消费品如录像机之类经销商。在许多工业部门如在钢铁业中，我们可以“轻松”地引入人家的新技术，可是我们偏不这样做，不是淘汰国内陈旧、过时的平顶炉，采用日本的大型氧气炉和连续浇铸法，而是退居守势，以保护主义政策抵制日本钢铁企业的“不公平”竞争。结果我们的实际收入减少了，因为买钢的费用增加了，最后留下一个衰弱的钢铁业，只要它在国内市场中受到保护，它就永远没有竞争力，也没有进行竞争的内在动力。

这种相对的经济衰落产生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影响，在经济上，美国人面临着生活水平相对下降的危险。一个临时过往的旅游者（在美国的外国人，或是在国外的美国人），如果明显地看到了我们经济衰落的迹象，这在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心理上会有什么感受呢？既然我们还没有这样的经历，也就无从得知，但如果我们也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我们肯定不会高兴，没有人愿意看到别人能买得起的东西自己买不起。

随着生活水平差距的扩大，人们对政府经济工作的不满情绪逐渐加深，收入差距越大，人们对改变现状的要求越具有革命性。今天的穷国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些国家与几百年前的穷国相比并不算贫穷，他们只不过是和今天的富国相比显得贫穷罢了。如果我们也变得相对贫穷了，我们同样也会感到不满。

从政治方面说，经济的衰落意味着我们必须对个人消费作出更大的牺牲，以维持我们在世界上的影响，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尽管苏联的人均收入远远低于我国，可是，它已成为我们在军事上和地缘政治上势均力敌的对手，他们只需在国防方面投入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就行，但削减消费在民主国家中会造成在独裁国家里所没有的紧张关系。美国人会逐渐明白他们无力维持战略军事力量来保卫比自己富裕的国家，无力再用巨额经济援助来推动诸

如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和解。国际经济负担有些是可以推给比我们更富有的盟国的，不过这将意味着让它们可以更多地对国际重大事务作出决定。在许多情况下，例如埃以之争，德国人和日本人也许不会和我们作出同样的决定。

最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的解决办法是“给企业以经营自由”；削减政府的社会开支；改革税制以鼓励储蓄和投资（将纳税负担从储蓄者转嫁给消费者，亦即从富人转嫁给穷人）；取消各种妨碍工商业经营的政府法规，尤其是1978年已经削减的资本收益税应进一步削减；取消企业分红的“重复征税”；冻结对穷人和老年人的转移支出；环境保护主义者应被看成是一种对经济的威胁而受到抵制。拉弗曲线像野草一样到处蔓延，说明应该以减税来恢复私人的首创精神，只有像以前那样艰苦奋斗、自由经营，经济才会有效率。

在考虑这种解决办法时，首先应该记得，我们的竞争对手没有一个是由此取得成功的。在美国，政府税收不过略为国民总产值的30%挂零，而在西德却超过了50%，其余有15个国家的税收占国民生产总产值的更大比例。^①

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不仅大，而且管得宽。西德法律规定工会领导人必须参加企业的董事会，瑞典则以其完备的福利制度闻名于世，日本对于投资实行中央统一计划和政府控制，其干预程度之深能叫任何一个老实的资本家想哭。其他国家的政府还拥有和控制着大型企业，西德的伏尔卡斯瓦根汽车公司和法国的雷诺汽车公司就是例证。我们国家的法规和限制并不算太多，相反，相比之下我们的法规和限制相当少。许多美国企业吃惊地发现，在国外根本就不能像我国那样自由地解雇工人，很难说这是好事还是

^① 联合国：《分国帐户统计年鉴，1977年》，第1卷（纽约，联合国，1978年），第348页。

坏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比美国更容易地解雇工人。

同样,我们的竞争者也没有靠扩大收入差距来鼓励工作的积极性和储蓄,事实上他们采用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办法。如果把人口中收入最多的10%与收入最低的10%来进行比较,西德的差距比我们小36%,但人们工作很卖力,日本比我们小50%,^①工作更卖力。如果收入的差距可以提高个人的积极性,那么我们的积极性理应很高,因为在工业国家中只有法国的收入差距比我们大些。

再从美国的历史来看,在“新政”和政府干预开始之后,我们的经济状况就比“新政”前要好。我们经济的黄金时代是在40年代和50年代、60年代。40年代的人均收入实际增长了36%,那时经济是以指令性的(社会主义式的)战时经济方式运行的。60年代的人均收入实际增长了30%,^②而全部增长都是靠社会福利计划取得的。自从实行政府干预以来,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相当于政府干预或社会福利计划实施之前增长率的两倍多。

人们常说,如果我们还不改弦易辙,扭转政府管得太多的趋势,英国经济就是一个可怕的前车之鉴。可是,不管英国经济的毛病出在哪里,它都与政府管辖范围的大小没有多大联系。英国的经济增长早在19世纪就落后于主要的工业国家,并从此一蹶不振,低增长不是从1945年工党执政才开始的,相反,1945年以后英国的增长要比以前好些。英国的经济处境无疑很糟,但世界上也有不少像西德这样成功的先例,英国的问题并不在于政府管得多了还

① 马尔科姆·索耶和弗兰克·沃塞曼:“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收入的分配”,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展望》,1976年7月,第14页。

②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1929—1974年美国的国民收入和产品帐户》,第312页。

是少了。

我们和国外的经验都表明，社会干预和社会支出同经济成就之间并无冲突，倒的确是由于缺乏投资计划、职工参与制和社会开支，我们的经济才没有搞好。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已经表明，如果路子正确，社会改革就既有利于生产，又符合公平的原则；如果路子不正确，当然也可能既造成巨大损失，又导致分配不均。同样，如果路子正确，所谓“让企业自由经营”也可能有一定的好处。目前确实存在许多不必要的法规和限制，束缚了我们的经济，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法规，而是如何找到合适的法规。

美国的问题不是再回到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没有这样的黄金时代了），而是要认识到：我们这个经济结构，在其整个历史中，从未有过像战后日本和西德那样的成就，我们现在必须模仿和采取其他国家成功的政策和创新，沉溺于我们虚幻的过去，只会导致我们经济全盛时代的完结。

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并不只限于低增长，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到处都存在着令人头痛的、持久的、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所不能解决的难题，能源、通货膨胀、失业、环境恶化、越来越多的法规、少数人与大众之间收入的悬殊，这些问题不胜枚举。由于我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常常听到人们哀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各种矛盾既然不能得到合理的调和，政治上的对抗就像瘟疫一样笼罩在我们头上。旨在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计划，由于力量强大的少数人反对而遭到否决，没有人能强制执行决议，也没有一项决议能博得所有人的赞同。

问题确实存在，但从未得到正确的诊断，一个人从未具备有的

能力，当然也谈不上会丧失它。我们这里所说的丧失行动能力是指：（1）从全球性冷战问题向国内问题的转移；（2）公开地将巨大的经济损失强加于国民。

当国内问题相对于国际问题显得更重要时，行动变得日益艰难。国际纠纷可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被描绘成一些特殊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每个人都在公平地作出牺牲，共御外侮，既然每个社会成员都面临着共同的威胁，因此容易形成压倒性的一致意见，两党制也可以行得通。

在采取任何政策解决国内问题时，由于对一部分美国人有利，对另一些美国人不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内问题的争论就要大得多。采取一种做法的结果是一部分人的收入会上升，但其他人的收入会下降，每个人牺牲的程度不一，有得到好处的，也有受到损失的。提高妇女和黑人就业机会的计划，必然会降低男性白人的就业机会，卡特总统内阁每增加一个黑人或妇女就业，就要解雇一个男性白人。

人们经常在问，为什么肯尼迪总统能够轻易地实施登月计划，而尼克松和福特总统连他们的“能源自主计划”都不能顺利地推行呢？原因很简单，打个比方说，要实现能源自主，某些美国人必须拆毁他们的家园；但是在月球和地球之间是没有任何人居住的。一般说来，每个人都欢迎能源自主，但要实现能源自主，不管采取哪种具体步骤都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对比起来，登月计划只须征得大家同意，具体步骤可以让技术专家去考虑。在国内问题上，手段和目的都会成为争论的对象。

在以下各章中将会看到，我们的每个问题确实都存在许多解决方案。我们面临的不是一大堆无法解决的问题，每个问题都有一些解决办法，不过这些办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求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有时占总人口的多数，有时只占少数——甘心忍

受他们实际生活水平的大幅度降低。经济上的得失加在一起，虽然通常得大于失，但确实有大量经济损失的发生，这些损失必须落实到个人身上，可是没有任何集团愿意为整体利益而蒙受这种经济损失。

最近我应邀向哈佛校友会谈谈加速经济增长的问题。我说，虽然我们都倾向于增加投资，但问题的核心是：为了增加投资机会，究竟应该向谁摊钱，降低谁的收入？如果要把美国在厂房和设备上的投资从国民总产值的10%提高到15%，应该从谁的手上拿走这部分收入呢？马上就有人提议取消福利开支，毫不奇怪，他是在建议降低某些人的收入。但是，我向他指出，福利开支仅占国民总产值的1.2%，^① 还有3.8%从哪里来呢？在取消了政府对穷人的救济之后，他们还准备削减谁的收入呢？这回再也没有人举手作答。

一个得失相等的赛局

这就是我们根本问题的核心所在：我们的经济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大多数问题都有好几种解决办法，只是所有这些办法都会使某些人承受大量的经济损失，既然没有人自告奋勇承受损失，而我们又不能强迫任何人承担这个重负，每个人都指望由别人承受必要的经济损失，结果任何解决方案都得不到采用。

我们已经基本上创造出一个罗伯特·阿德里在《领地法则》一书中所描绘的世界，要打退一只在它自己活动领域内觅食的同类动物，入侵者必须有双倍于对方的实力，但任何一个多数派都没有双倍于少数反对派的实力，于是我们互相否绝对方的提议，而我们

^① 美国商务部：《商业概况》第59卷，第7期（1979年7月），第43页。